



中華文史論叢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1/2006
總第八十一輯

中華文史論叢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二〇〇六年 第一輯 總第八十一輯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錄

論文明民族與野蠻民族之消長·····	呂思勉	1
知識視野中的鄭和下西洋·····	萬 明	7
從“朝天”到“燕行” ——17 世紀中葉後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 ·····	葛兆光	29
流動的風景與凝視的歷史 ——晚清北京畫報中的女學·····	陳平原	59
何謂“唐宋變革”？ ·····	柳立言	125
唐代的一夫多妻合葬與夫妻關係 ——從景雲二年《楊府君夫人韋氏墓誌銘》談起 ···	陳弱水	173
論唐代的分家析產 ·····	張國剛	203
李白與羌族文化 ·····	周勛初	245
論宋代杜詩注釋的特點與成就 ·····	莫礪鋒	263
上博楚簡《恒先》語譯 ·····	李 零	281
長安子午谷金可記摩崖碑研究 ·····	周偉洲	287
元濬州天寧寺帝師法旨碑譯釋 ·····	蔡美彪	303

《詩比興箋》作者歸屬問題補證	夏劍欽 319
《中華文史論叢》恢復刊號出版暨約稿啓事	333
《中華文史論叢》來稿體例及徵引文獻格式	335

論文明民族與野蠻民族之消長

呂思勉

抑文明民族見陵於野蠻民族，非獨中國也。印度之於西亞，希臘之於馬其頓，羅馬之於日爾曼，數者實如出一轍。然則武力之不競，乃文明民族之通病，非中國獨然也。欲求中國武力不競之原因，又非先求文明民族武力不競之原因不可矣。

論者多謂文明民族，好鬥之心，健鬥之力，遠非野蠻民族之比，是以每遇輒北。斯言似是而實不然。何者？果如所言，則必文明民族，真不能敵野蠻民族而後可，然考諸歷史，殊非事實也。五胡亂華之世，北方爭鬥，蓋罕用漢族爲兵，即有之，亦不視爲精銳，此非東晉後始然，後漢以來，久啓其端矣。此蓋以異族性質強武，故中國亦好用之，如張宗昌等之喜用白俄人也。然當高齊之初，高敖曹所將漢人，即視鮮卑並無遜色。而如東晉之末，宋武帝北伐之師；蕭梁之世，陳慶之送元顥北還之衆，其强悍善鬥，雖野蠻民族視之，猶愧弗及焉。此外如元兵之強，而完顏彝能屢勝之；清初起時之銳，而袁崇煥能屢卻之，此等事不勝枚舉。故謂文明民族，戰鬥之力，不逮野蠻民族，乃從其勝負既定之後，辜較成敗爲之辭，而非真就每次爭戰，詳察其實，而得此說也。夫其說既係事後辜較之談，則安知其勝負之原因，不別有所在，而果在兩軍之戰鬥力邪？

夫就文明民族與野蠻民族全體衡之，其好鬥之心，與健鬥之力，誠皆非野蠻民族之敵，然以中國之大，豈待舉國尚武，而後足與蠻夷敵哉？賈生論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史記》謂匈奴，自左右賢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人，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則匈奴甲騎尚不足二十四萬，老弱同於壯丁，婦女同於男子，亦不過百萬耳，此豈待以舉國之衆以敵之哉？蘇軾謂全趙可以制匈奴，信不誣矣。夫必待舉國之衆，强悍善戰，而後足與野蠻民族敵，則文明民族，因其生事教化之殊異，誠不免爲一難題。若一兩縣尚武之衆，而謂中國無之，豈情實乎？況乎人之性質，可以訓練而成，舉全國之民，悉訓練之而臻於强悍，自非旦夕間事。若謂數十百萬之衆，不能訓練以躋於有成，則非情實也。況乎五方風俗之不齊，又有不待訓練，本已强悍者邪？然則謂文明民族之不敵野蠻民族，由其人民性質之柔弱者，非也。至於財力器械之不敵，則皆與遠西接觸後事，昔日之無此情形，更不俟論。然則中國不敵夷狄，其原因果安在哉？

孟子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文明民族之不敵野蠻民族，此蓋爲其真原因。古來第一漢奸，當推中行說。中行說論漢與匈奴之長短曰：匈奴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漢則禮義之敝，上下交怨。伊古以來，爲此等說者，不知凡幾。至於明清之際，亭林蒿目世變，痛心宗國之淪亡，而其論中國外夷強弱之原因，猶無以易此說也。然古來持以等議論者，皆以爲中國重滯，外夷徑捷。中國重滯，由於文繁，外夷徑捷，由於法簡，歸其原於政治之得失而已，而不知有分數則使衆如使寡。使衆如使寡，則用大猶用小也。而小敵之堅，大敵之禽，十則圍之，五則攻之，衆且大者之勢，卒非寡弱者所能與也。然則中國之不敵外夷，尚不在其政治之徑捷與重滯，而別有所在矣。嗟乎，孟子所謂天時地利，

不如人和者邪！夫以中國之文明，用中國之衆且大，謂其不能有分數，使之如寡小者，不可得也。抑觀歷代之法令，雖不足以云徑捷，然使如其實而行之，雖稍重滯，謂政事軍事，必致於敗壞決裂，不可收拾，無是理也。所以敗壞決裂，不可收拾者，皆名實不符。覈其名猶是，而按其實則非，有以致之耳。所以名實不符者，則由其社會之積弊已深，私人之利益，與公衆相反者衆也。今請舉實事以明之。當日俄戰爭之際，日本有所謂代耕之俗焉，一夫出征，則其所荒棄之田，由其鄰里代爲之耕，而凡征人之妻子，有所求於市，市人或廉其價，有疾，醫者或不取費，爲之療治。其事殊，其意一也，中國有之乎？夫士之臨陣而屢北，非果畏創夷，怯白刃也，其十八九，蓋亦由其後顧而不能無憂焉。管夷吾有老母在，則三戰而之北，古之人已然矣。然則如日本之士，與中國之士，使之陷陣卻敵，奮不顧身，孰爲有後顧憂，孰無之乎？人孰不好生而惡死，然所謂生者，非徒倏然七尺之軀，偷息於天地間云爾，固貴有生人之趣。今使戰敗而歸，父母不以爲子，妻不以爲夫，友朋不之齒，其生人之趣安在？安得不輕死傷，重降北，而如其輿論久背公黨私，雖爲降虜，爲敵間諜，甚者且爲之先驅，苟其富貴利達，父母妻子，宗族交遊，引以爲光寵如故也，洪承疇、吳三桂之徒，安得不接迹於世哉？況也，奪伯氏邑而無怨言，徙膠立而致其垂泣，管葛之用心無特法，其不可多得也久矣。世固有慷慨之士，本願效忠於國，其才亦有可用，徒以扼於權姦，不獲申理，遂不恤反顏事仇者，宋末之劉整、夏貴是也。其罪固通於天，然遏抑之者，亦寧能不分負其責哉？此等事悉數難終，要皆文明社會多，而野蠻社會少。文明社會有之，或冤沈海底，野蠻社會有之，必較易平反。故文明之人，非生而怯也，其社會固束縛之，馳驟之，使之不得不怯，甚至迫害之，使不得不從敵。野蠻社會之人，則皆反是。故文明人之見陵於野蠻人，非不幸也，優勝劣敗，理有固然。論者或以文明人之見陵於野蠻人，而嘆福善

禍淫之不足信，而不知此正福善禍淫之最可信者。何則？文明人雖文明，其社會組織固惡，野蠻人雖野蠻，其社會組織固善也。惟社會組織雖善，文明程度太低，則亦不足戰勝。歷代野蠻人所以受制於文明人者以此，然至其文明漸進，而足以與文明人爲敵，則文明人之厄運遂至。如鮮卑，其初屢見破於中國與匈奴，然至精金良鐵，多漏出塞，而鮮卑有其器，漢人遁逃，爲之謀主，而鮮卑有其法，檀石槐遂兼匈奴，擾漢邊，中國任名將，發大兵，三道出塞，一時敗績矣。然則今日之黃白人，雖若天之驕子乎？至於利器悉爲黑人之所有，以黑人健全之社會組織，用白人之利器，今之所謂文明人者，能否久居人上，或不免爲蒙古盛強時之中國人與西域人，猶未可知也。夫以今日之白人，其勢力誠如驕陽當天，未知時日之曷喪。然世事之變遷，寧可逆料，當唐天子稱天可汗，盡服從北夷時，安知室建河畔一小部落曰蒙兀者，乃能創建跨據歐亞之大業哉？

故民族強弱，究極言之，實與治化隆汙，息息相關。而治化之隆汙，其本原，實在社會組織，徒求之於政事之理亂，抑其末焉者也。此等究極之談，目前言之，誠若迂闊而遠於務。然如現在普通人之見解，以爲只須訓練人民，使之健鬥，又或標榜一二民族英雄，資其矜式，便盡提唱民族主義之能事，則可謂膚淺之至。從古以來，人民無以一人之力，與異族鬥者，皆合若干人爲一團，以與異族鬥。合若干人爲一團，以與異族鬥，則此一團中人之和，與夫一團中人人之勇相較，而和之用實爲較大。何則？惟一團中人相與和，乃能致一團中人人之勇。否則雖有勇夫，不過仗劍死敵，以求其一心之安，於國事初無絲毫裨益，其下焉者，或不免反顏事仇也。夫欲徹底改善社會組織，自非旦夕間事，然居今日而言提唱民族主義，亦不宜專從粗淺處著眼，羣之和，重於一夫之勇，雖不能徹底改革，亦不可不有事焉。具體言之，則如今日，能訓練人民，使之皆可爲戰士，故屬要著，然如何籌畫，乃可使出征之士，較少後顧之憂，

乃可使爲國宣勞者，可爲公衆所愛慕，袖手旁觀，若臨陣奔北之士，可爲公衆所不齒，以等風氣之造成，較諸授人民以行陳擊刺之技，實尤要也。言不能悉，舉一端，他可類推。

昔時讀史者，多注重於個人之行爲，故多崇拜英雄，今日之眼光，則異於是。何者？知事之成敗，複雜萬端，成者不必有功，敗者不必有罪，謀勝者不必智，戰敗者不必怯也。生物界之情形，大抵中材多，極強極弱者少，惟人亦然，無時無地無英雄，亦無時無地無庸劣之士。羣之盛衰，非判之於其有材無材，乃判之於有材者能否居於有所作爲之地位，庸劣者能否退處不能爲害之地位耳。故望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小人道長，言消長而不言有無，其意可深長思也，此義言故與學者，皆不可不知也。

（本文作者係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已故教授）

知識視野中的鄭和下西洋

萬 明

作為事件的鄭和下西洋，海內外的研究已經碩果累累；作為經驗的鄭和下西洋，特別是作為知識積累重要里程碑的鄭和下西洋，仍有探究的空間。從知識的視野來看鄭和下西洋，規模宏大的遠航正是中國人海外知識累積與遞進的重要歷程。這一認識有必要從鄭和研究的興起談起。

上個世紀初，鄭和研究興起，作為 20 世紀史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它至今已經走過了百年歷程。值得注意卻鮮見提及的是，鄭和研究的重要性在於研究的起步不同凡響，是與新史學同步產生的。1905 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以筆名“中國之新民”發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一文，^①此文對於傳統史學具有突破性的意義，是從舊史學走向新史學的一個典範。它突出地表現在兩點上，第一，研究從一開始就與祖國命運聯繫在一起。梁啟超這位中國現代史學之父，有慨於中國被西方列強侵略和瓜分的現實，於 1902 年在《新民叢報》發表《新史學》，獨樹一幟，倡導新史學。他指出，史學是“國民之明鏡”，“愛國心之源泉”，並將普通國民身份意識

① 中國之新民（梁啟超）《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新民叢報》1905 年，21 期。

的啓蒙作為史學的功用提了出來。既然新史學的意義就在於啓蒙“國民意識”，那麼探討中華民族在世界歷史中地位這一重大命題，也就理所當然成為新史學的題中之義了。《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一文的產生，緊接在《新史學》發表後，是梁啓超史學革新思想理路的延伸。不僅是對於航海家偉績的闡示，而且是對中國在世界所處空間位置的定位思考。第二，研究從一開始就是對傳統舊史學的一種知識視野的超越。梁啓超充分肯定鄭和是祖國的偉大航海家，對鄭和遠航投以關注，不是偶然的，正是有感於傳統舊史學的弊端，針對當時國民只知“家”，不知“國”，更不了解“國”以外還有一個世界的狹隘的知識觀念。基於對傳統史學的反省與批判，他向國人展示了航海與世界的關係，一個“全球比鄰”的世界知識體系。

上世紀後半葉，中國史學又出現了一個重要變化，也可以說是一個方向性的轉折，即發生了從政治史走向社會史，從社會上層發展到社會下層的研究重點的轉移。史學研究視角的轉換與下移，至今是我們研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反思一下，對於下西洋這一震撼世界的偉大航海活動，迄今為止，我們探討最多的是明朝統治者的目的和效果，採取的是王朝史的觀點，較少從人類知識增長的視角看問題。而人類知識增長的歷史，是人類文明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特別關注。毫無疑問，“萬方來朝”是中國古代帝王通有的政治理念，然而，作為一次偉大的航海活動，我們不能只看作是帝王和宦官的事業，而應視作中國古代文明的一次集中展示，中國古代航海技術與知識的一次集大成體現；與此同時，還有一個我們往往忽略的問題，這就是遠航與海外的關係是一個文化互動關係，遠航不僅輸出了中國文化，也是中國人對於海外所知世界的一個加深了解和認識的過程，是中國人海外知識累積與遞進的重要過程。知識是一個不斷生成的概念，人們

獲取的知識在社會實踐中不斷地建構起來，具體存在於人們之間的活動和交往之中。鄭和遠航走出國門，所至地方多達當時亞、非二十幾個國家和地區，其間所獲取的海外知識，過去更多地被簡單理解為地理知識，而現有成果基本上也是在地理知識層面上加以介紹和描述。實際上，遠航持續近三十年，知識的獲取，應該說遠不只在地理方面，而是具有極為豐富多彩的文化內涵。重要的是，在知識的積累中，人是載體，人們世代繁衍相傳，知識通過人的載體世代獲取、繼承和傳遞。下西洋實際參與人員至少達十幾萬之多，遠航得到的海外知識異常豐富，那麼直接參與活動的大批普通人親歷海外，他們如何看待，如何思想，如何感受，如何傳遞了作為知識的歷史記憶的？對此，尚有待發覆，值得認真加以研究。

海外知識的積累，與任何領域的知識一樣，可以分為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的兩種知識積累形式。顯性知識的積累由於文獻的記載而彰顯和傳承，而隱性知識存在於人們實踐經驗連續傳遞的過程中，常常由於缺乏文字記載而出現斷裂，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失傳現象。這裏主要涉及文獻記載的知識累積範疇，從兩條線索上展開：一是官修正史，一是民間記述。沒有比較就沒有鑑別，沿着這兩條線索，我們選取鄭和下西洋前後有關海外記述的文本為例，加以對照。具體地說，主要以跟隨鄭和三下西洋的馬歡所著《瀛涯勝覽》為例，與遠航前包含海外認識內容的官修正史與民間記述進行比較，目的是藉此了解下西洋前後中國人對海外的知識面貌究竟如何，追蹤下西洋前後明朝人對海外知識積累的歷史軌迹，引證出鄭和時代知識積累的特色，揭示遠航與海外知識累積的關係，說明航海極大發展的時期，也正是中國人對海外知識積累不斷深化的重要進程。

一 知識累積的一條線索：官修正史

作為知識累積的一條線索，官修正史方面，在鄭和下西洋前，明初有《元史》的纂修，因此我們以《元史》為例。

明初官方修《元史》，以李善長為監修，宋濂、王煒為總裁，經過兩次纂修而成。明初大儒，先後兩次任纂修總裁的宋濂，曾詳細記載此事：

洪武元年秋八月，上既平定朔方，九州攸同，而金匱之書悉輸於秘府。冬十有二月，乃詔儒臣發其所藏，纂修《元史》，以成一代之典。……至若順帝之時，史官職廢，皆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為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國上之。又明年春二月乙丑開局，至秋七月丁亥書成，又復上進。……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①

宋濂講得很清楚，一是時間上，《元史》自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下詔纂修，至洪武三年八月，經歷一年多，先後兩次纂修而成；二是《元史》纂修是在明朝攻下元都，“金匱之書悉輸於秘府”的條件下，又一次“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集中了全國的涉及史事的典籍文獻，最終補充完成的。

《元史》所設《外夷傳》，是全書關於海外記載最集中的部分，收入《外夷傳》的有高麗、耽羅、日本、安南、緬、占城、暹、爪哇、瑠(琉)球、三嶼、馬八(巴)兒等國。

① 《宋學士文集·鑾坡前集》卷一《元史目錄後記》，四部叢刊本，頁13上。

《外夷傳》大致說明了明初官方對於元朝與海外關係的了解範圍和認識，可以說相當簡略。其中，包括在下西洋地域範圍內的有占城、暹、爪哇、馬巴兒等國。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根據當時人的“西洋”概念，則占城、暹、爪哇都在東洋之列，那麼在實際西洋範圍內的就只有馬巴兒等國了。^①

以《元史·爪哇傳》為例，開始一段話，很可以說明當時人對爪哇的認識：

爪哇在海外，視占城益遠。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後至其國。其風俗土產不可考，大率海外諸蕃國多出奇寶，取貴於中國，而其人則醜怪，情性、語言與中國不能相通。^②

《傳》中所述爪哇的地理方位不明確，只有一個比占城更遠，先至占城再到達爪哇的大致說法；對於爪哇的風俗土產不了解，而且說明語言不能相通。接下來，全篇內容幾乎都是圍繞元朝征爪哇之役進行敘述的。這樣做的原因，《傳》中寫得很清楚，是因為“世祖撫有四夷，其出師海外諸蕃者，惟爪哇之役為大”。而《傳》中對於征爪哇之役以後的史事，則完全没有交待。

在《元史·成宗紀一》中，我們見到元貞元年（1295）九月爪哇“遣使來獻方物”的記載；^③在《元史·陳佑傳》所附其弟《陳天祥傳》，看到了時人對征伐海外後果的評價：“近三十年，未嘗見有尺土一民內屬之益，計其所費錢財，死損軍數，可勝言哉！”^④綜

① 馬歡《瀛涯勝覽·紀行詩》：“閩婆又往西洋去。”閩婆即爪哇，說明不在西洋範圍，而屬東洋。另費信《星槎勝覽·爪哇國》記載：“地廣人稠，實甲兵器械，乃為東洋諸番之衝要。”明確說爪哇位於東洋。

② 《元史·外夷傳三·爪哇》，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年，頁4664。

③ 《元史·成宗紀一》，頁396。

④ 《元史·陳佑傳》附《陳天祥傳》，頁3949。

合起來，從《元史》對於爪哇的記述看，反映出在元朝爪哇之役以後，直至明初，明朝上層對於爪哇的信息仍為相當隔膜的狀況。

再看《馬八兒等國傳》，這是《元史》中對西洋最重要的記述，但也頗為簡略：

海外諸蕃國，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俱藍又為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至其國約十万里。其國至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風，約十五日可到。比餘國最大。^①

這裏說明在當時海外各國中，馬八兒和俱藍是最大也最有影響的國家，很是強盛。元朝從當時聞名遐邇的海港泉州出發到達那裏，要經過“約十万里”海路。這是記載海路所到最遠的地方。阿不合大王城疑即《元史·地理志六·西北地附錄》之阿八哈耳(Abhar)，位於里海南，今伊朗的蘇丹尼亞(Sultanieh)東南。^②以下《傳》中敘述了元世祖時遣使招諭，馬八兒“奉表稱臣”以及遣使貢獻方物的交往過程，表明了元朝與馬八兒建立了政治關係。

《元史·亦黑迷失傳》中，有可以為補充的地方，記述了亦黑迷失至元二十四年(1287)出使事迹：

使馬八兒國，取佛鉢舍利，浮海阻風，行一年乃至。得其良醫善藥，遂與其國人來貢方物，又以私錢購紫檀木殿材並獻之。

① 《元史·外夷傳三·馬八兒等國》，頁4669。

② 馮承鈞原編，陸峻嶺增訂《西域地名》(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版，頁1。

由於亦黑迷失四次出使，“四踰海矣”，於是“帝憫其勞，又賜玉帶，改資德大夫，遙授江淮行尚書省左丞，行泉府太卿”。^①

元朝出使西洋馬八兒國的重要使臣還有廣東招討司達魯花赤楊庭璧。在《馬八兒等國傳》中，列有楊庭璧奉詔招諭後“來降”各國名稱，諸國凡十：依次是馬八兒、須門那、僧急里、南無力、馬蘭丹、那旺、丁呵兒、來來、急蘭亦斛、蘇木都刺。但《傳》中對馬八兒以外的幾國，只云“皆遣使貢方物”，再無片言隻語的說明。

參考前人研究成果，上述十國的地理位置大致如下：^②

馬八兒和俱藍這兩個“綱領諸國”的國家，都在印度西南海岸。

馬八兒，是 Ma'bar 的對音。阿拉伯語稱渡口為 Ma'bar。位於印度西南海岸，即 Malabar 海岸一帶。

俱藍，即宋代趙汝适《諸蕃志》所稱故臨，是阿拉伯語 Kulam 譯音，即今印度西南海岸的奎隆（Quilon）。

須門那，有三說，一說在今印度西北古吉拉特邦的蘇姆那（Somnath），一說在印度孟買以南的喬兒（Chaul），還有一說就是蘇木達，指南印度的 Dvora Samudra，國名 Deogiri，也即《元史》吊吉而國。

僧急里，在今印度柯欽（Cochin）北面克朗加諾爾（Cranganore），古名 Singili 譯音。

南無力，即南巫里，也就是《爪哇史頌》中的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古國名 Lamuri 譯音，《馬來紀年》中的 Lambri。

① 《元史·亦黑迷失傳》，頁 3199。

② 參見〔日〕藤田豐八校注《島夷志略校注》，國學文庫本；汪大淵著，蘇繼庠校釋《島夷志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陳佳榮、謝方、陸峻嶺《古代南海地名匯釋》，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66、663、605、833、583、167、392、108、400、603、418。